

# 年方九十

周巍峙文集 4

(1988-1996)

# 年方九十

——周巍峙文集 4

(1988-1996)

# 目 录

## 第四卷

(1988—1996年)

不知有机巧 无事干心胸.....	(1)
——怀念马彦祥同志	
《沙可夫诗文选》序 .....	(10)
从“地方小戏”的编辑工作谈起 .....	(20)
——戏曲音乐集成“地方小戏”编辑工作会议的总结	
积极开展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 .....	(35)
有胆有识 秉笔直书 .....	(46)
散记和反思 .....	(52)
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建议 .....	(68)
人民战争的壮丽史诗 民族精神的艺术再现 .....	(71)
在抗敌演剧队队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	(76)
集邮是群众文化的重要方面 .....	(80)
——答《集邮》杂志记者林轩	
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不畏困难 坚持到底 .....	(84)
——在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总编辑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宗教音乐编辑工作的几点意见 .....	(92)
在戏音集成北京卷初审总结会上的讲话(摘要) .....	(97)

发扬延安戏剧革命传统 创造社会主义新型艺术	(111)
——《延安戏剧图录》代序	
《邮票中的艺术世界》序	(120)
《东北革命文化史料选编》序	(122)
抗日根据地文艺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的伟大贡献	(125)
在艺术科学元老新春联谊会上的讲话	(139)
接管时期的天津文艺工作	(142)
南沙颂	(149)
——献给英雄的南沙战士	
喜登南海巨舰述怀	(150)
《论梆子腔》序	(151)
编写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 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153)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回顾	(178)
英雄的岁月	(225)
深切的怀念	(228)
重视文化史料的搜集整理 深化解放区文艺研究	(235)
征集 编纂 研究革命文化史料	(239)
默默耕耘终一生	(247)
在《冼星海全集》首发式上的讲话	(251)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序	(254)
在集成志书规划工作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271)
一位为科普事业鞠躬尽瘁的伟大战士	(283)
——深深怀念身残志坚的爱国科学家高士其同志	
研究过去 总结现在 展望未来	(287)
革命文化史料展览的重要意义	(293)
评弹艺术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300)

解放思想 突出特色.....	(312)
——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	
审稿会上的讲话	
发扬拼搏精神 早日完成集成志书编纂任务.....	(324)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座谈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	
团结协作 善始善终.....	(344)
祝贺《格萨尔史诗》的新生.....	(367)
歌声来自心声.....	(370)
——《永不消逝的歌》(代序)	
由衷的崇敬 深切的怀念.....	(374)
汗珠儿长成新米了.....	(376)
——《吼狮——塞克文集》序	
怀张曙同志.....	(383)
洞箫哪里去了.....	(384)
——程云《民族音乐论文集》序言	
音苑史卷寓风云.....	(387)
——《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卷》序	
修筑中华民族宏伟壮丽的“文化长城”.....	(395)
“老有所为”与“老有所乐”.....	(403)
——祝贺文化部老干部合唱团成立 10 周年	
国庆节是我最忙的时候.....	(409)
重视交响乐创作演出水平的提高.....	(412)
克敌制胜 有笔有刀.....	(414)
——《徐灵作品选》序	
艰苦创业四十年.....	(418)
——《中央歌剧院院史文集》序	

欣赏字帖是美的享受.....	(427)
保证质量 大力加速编纂出版进度.....	(429)
《校园歌曲集》序.....	(439)
张曙同志不朽.....	(441)
愿战火纷飞中的革命文艺传统永存.....	(443)
——在全国革命文化史料工作表彰会上的讲话	
时代的最强音.....	(469)
——纪念《义勇军进行曲》创作 60 周年	
弘扬红军传统 做好革命文化的传人.....	(474)
在中国田汉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	(478)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壮烈献身的战士.....	(481)
——《李公朴画传》代序	
八十自嘲.....	(489)
在纪念茅盾诞辰百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490)
在《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吉林卷》审稿会上的讲话.....	(492)
六次文代会闭幕词.....	(497)
缅怀田老(试步田老悼聂耳诗原韵).....	(500)
附:悼聂耳(田汉)	

## 不知有机巧 无事干心胸

### ——怀念马彦祥同志

去年7月4日，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同志八十寿辰，我以唐代诗人岑参《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作》中的两句诗“不知有机巧，无事干心胸”书赠给他，作为纪念。我认为，这两句赞颂友人心地纯净，行为高尚的诗，作为彦祥同志性格和为人的写照，是十分准确的。不料仅仅过了半年，今年1月8日下午，我却突然接到了他与世长辞的噩耗！我的心不由得震悸起来。彦祥同志因病住院，我曾几次去医院看望他。几天前我看他时，他还安慰我，是鼻子流血，可能是入冬上火，没多大关系，接着他就谈起当前戏曲界的情况，问到演员的生活。他对体制改革、艺术革新、振兴戏曲都非常关心。他那时因为失血过多，身体已很衰弱，说话十分吃力，但精神仍很兴奋，一股忧虑之情，溢于言表。在他临危的前一天，我还守在他的床边，默默地望着这位处于昏睡状态的老友，祝愿他这次能战胜病魔，延年益寿。谁料到他竟这样匆匆而去了呢？我感到我又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挚友和同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我与彦祥同志并肩工作战斗四十年，这期间的许许多多往事，又一件件重新浮现在眼前……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48年8月，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和华北文艺界代表大会同时在石家庄举行。有一天，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走进了我们文艺界代表大会的会场。主持会议的周扬同志向

大家介绍，他就是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同志。他是来参加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和文艺界代表大会的，是到解放区来和我们一起战斗的。我们的目光立刻聚集在他的身上。大家首先是感到意外，紧接着就是一阵非常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名家的来临。

他个子不高，但却很有精神。他那总是含着微笑的眼睛，使人立刻感觉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啊！眼前站着的这个人，就是那个曾和著名戏剧家洪深、田汉、欧阳予倩长期合作，一起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导演演出过《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几十部著名作品的优秀艺术家马彦祥！就是那个曾经撰写过《秦腔考》、《二簧考源》、《地方剧演技溯源》、《论地方剧》、《地方剧考源》等论著的戏曲史论研究家马彦祥！就是那个曾经主编过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和北京《新民报》副刊《天桥》，因发表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而遭到迫害，愤而辞职的坚强不屈的新闻战士马彦祥！就是那个于1947年在北平主持戏剧节活动，在演讲中当着国民党特务的面，痛斥国民党黑暗统治并团结李宗义、梁小鸾等著名演员，上演田汉同志的名作《琵琶行》的文艺斗士马彦祥！

他是上海《保卫卢沟桥》的剧作家之一，我是负责该剧歌咏工作的曲作者之一，当时没有直接交谈，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真是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华北文联负责人，同时他还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所属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不久他就去了当时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村，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和周扬同志建议他抓一下戏曲改革工作，他欣然从命。为了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戏曲的糟粕进行清理，使戏曲的精华得到发扬，推动这古老的艺术能够赶上飞速发展的时代，我在他的带领下投入了戏曲改革的艰苦战斗。在周扬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传统曲目

要根据有益、无害、有害的标准进行整理改革的意见以后，他认为这是“推陈出新”方针的发展和丰富，问题更明确了，他的工作劲头更大了。为了深入、具体地了解情况，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去剧场看京剧演出，到后台和演员们谈戏，回来以后他还要忙着改戏。在那些紧张而愉快的日子里，彦祥同志似乎从来就不知疲倦一样，他是那样精明干练，有胆有识。他对戏曲的了解，简直如数家珍。他对演员们的愿望要求了如指掌。对于彦祥的渊博学识，机敏才干，以及他那高度的组织才能周围的同志十分佩服，我更是从他的戏改工作中，从他的言谈中，得到很大的教益，为自己增添了一位能够精诚合作的同志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在石家庄，我们虽然只相处了短短四个月，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过了整整四十年，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48年12月，我和他先后离开石家庄，我后来参加了天津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彦祥则参加了北平市军管会文艺部工作，继续并肩战斗在戏曲改革的第一线。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文化部，由著名作家沈雁冰当部长，周扬、丁西林任副部长，彦祥作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同志的得力助手，担任了副局长，我则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50年两个局合并，田汉任艺术局局长，彦祥仍任副局长。可以说从这时起我同彦祥就从未分开过，和他一起工作、战斗、生活，就连在十年浩劫中，我们都同属一个“中央专案组”，经常住在一个“牛棚”里，一同在湖北咸宁的水洼里劳动多年。

从1950年起，他作为人民政府的一员，就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在文化部艺术局长期担负着推进全国戏曲工作的重任。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他在戏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假如说从1926年他在复旦大学老师洪深先生的指导下参加复旦剧社、辛酉剧社，开始戏剧活动算起，到1948年的四十多年间主要是从事话剧艺术工作

的话,而在他的后四十年里却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社会主义戏曲事业了。

作为人民政府文化部门的一位重要的工作人员,他积极参与了戏曲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他根据有益、无害、有害的标准,认真清理京剧传统剧目,提出了禁演坏戏的方案;他参加第一次全国戏曲大会的组织工作,为继承和发扬戏曲优秀传统,推广优秀剧目,奖励优秀演员,作出很大的努力。他编辑《大众戏曲丛书》和《新戏曲》,宣传党的戏曲方针、政策,鼓励戏曲艺人团结、进步,鼓励戏曲艺术革新;他负责改革封建剥削性质的旧班社,取缔养女制度;他反对京剧“经理科”的垄断行径,起草了私营剧团的登记和管理办法,为建立合作性质的民间职业剧社开路。他还亲自担任文化部所属大众剧场的经理,把办公室设到剧场,身体力行,为整顿剧场旧秩序,树立剧场文明新作风想了不少办法。这些经验,对全国大中城市的剧场整顿,起到了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的要求不仅是保留一些优秀剧目,而且要求广大戏曲艺术家和戏曲工作者合作,努力进行艺术革新,繁荣戏曲创作,开拓新领域,表现新生活,出现新风貌,使戏曲能随着时代不断前进,在进行优良品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反对奴隶思想、反对封建道德观念,满足广大人民的文化欣赏要求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彦祥同志正是贯彻党的方针,倡导戏曲艺术革新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是改革戏曲旧制度,反对戏曲舞台色情、凶残、野蛮表演的积极分子,而且是一位通过艺术实践,建设新戏曲的实干家。他积极地担负起京剧《柳荫记》的导演。他的导演处理,手法简洁,清新隽永,富于创新精神。他善于把话剧导演的经验和戏曲艺术的特点融为一体,善于把新的戏剧手法和旧的戏曲传统表演结合起来。他还善于和戏曲演员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终于把《柳

荫记》排成一出主题突出、剧情集中、形式优美、技艺高超的新编历史剧。不仅国内称道，出国演出也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后来他还继续导演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歌剧《三座山》（改编成京剧）、京剧《武则天》和《逼上梁山》，他为古老的京剧艺术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为当时的首都剧坛送来了一阵阵清新的空气，为首都观众贡献了一批新的精神食粮。他一系列的大胆革新创举，也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戏曲排演活动从临场“说戏”到建立真正的导演制度，可以说是由彦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在许多大中城市的戏曲剧团中得到推广。这对戏曲艺术的革新和提高，使古老的艺术和新时代的戏剧技巧与表现手法能很好地结合，这不能不算是彦祥在戏曲革新和发展方面的一大功绩。他对别的导演、演员们在戏曲艺术上的创新成绩，都是热情鼓励，广为宣扬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彦祥同志恢复了工作，被分配到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顾问，同时还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导师，挑起了培养戏曲研究人才的重任。此时他虽然年逾古稀，但每次见到他，都使我感到他仍然和以前一样，热情、坦率、真诚，浑身充满朝气。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彦祥同志精神振奋，情绪昂扬。这一时期，他不但为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献计献策，尽心竭力，还不顾体弱多病，深入全国许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为振兴戏曲、繁荣戏曲事业，努力忘我工作，从来不知疲倦。有几次，他累得病倒，但仍念念不忘戏曲改革工作。甚至在脑血栓病还未痊愈的时候，就要求提前出院，赶紧工作。刚一出院，他就在夫人陪同下，拄着拐杖，出席各种会议，观看演出。有几次，我遇见他时，他都举着手中的拐杖，笑着说：“我现在有三条腿，比别人还优越。”言谈之间，仍然那样谈笑自如，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可是，有谁料到，正当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的时候，一

生立志戏曲改革，始终战斗在戏改第一线的彦祥同志，却这样快地离开了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亲密合作几十年的战友，我的心怎能不悲痛！

彦祥虽然长逝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将永存人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他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尊重党的领导，一直和党内同志关系密切，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终于从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在他 73 岁高龄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文艺界的的老前辈阳翰老在谈到马彦祥同志时，带着很深的感情说：“彦祥在上海和洪老（洪深先生）参加左翼戏剧运动，他虽没有参加左翼剧联，但他是跟党走的。后来领导救亡演剧队，到三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是厅长）等处工作，打着无党无派的旗号，实际他是接受党的领导的。”他说彦祥有个特点，政治上遇到什么困难，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总想到要向党内的同志请教。我这里举另一位文艺界老前辈夏衍同志谈到的典型例子。1943 年，中国青年剧社社长空缺，当时兼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的张治中邀请彦祥担任社长。马认为“三青团”名誉不好，婉言谢绝。张治中一再坚持要请彦祥担任此职，为此，彦祥找了夏衍同志征求意见。夏衍同志将此事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并谈到 CC 派中有人争着要担任这个社长职务，这个阵地我们应该有人去占领。恩来同志十分肯定地说：“马彦祥政治色彩不浓，由他担任比较合适，要劝他出来勉为其难，他假如不肯，就说这是我的意见。”第二天，夏衍同志就找彦祥传达了恩来同志的意见，并向彦祥保证，别人如对马有误解，他会替马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彦祥才同意担任此职。后来事实证明由彦祥去占领这个阵地是正确的。他在担任中国青年剧社社长两年半的时间里，只演出了郭老和阳翰笙、陈白尘、洪深、

吴祖光等同志的作品，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戏一个也没有演。在政治上不仅他本人拒绝填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并与夏衍同志商量，通过张治中挡住了国民党要全体剧社社员都参加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就在这个时期，彦祥同志曾向夏衍同志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夏衍同志劝他还是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更便于工作和斗争。当时他虽然没有参加党，但在后来的许多活动中一直依靠党的领导，十分尊重党内同志的意见。

1948年，他在石家庄开始抓戏曲改革工作。有一次，我对他说：“你过去是话剧专家，编剧、导演、演出样样行，现在却搞起了戏曲，真不简单！”他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党的安排啊！”短短一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一个刚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朋友，对党能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和党的领导同志的关系这么密切，是多么令人感动啊！这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解放后，他的工作更是一切听党和政府的安排，决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文化部周扬、田汉、齐燕铭等领导同志对他是十分器重，十分信任的，不仅要他参与拟定戏改政策这一重大工作，还要他做了大量的行政组织工作和团结广大戏曲人员的工作。戏曲界有些人事问题要他去排难解纷，在业务上有些繁重复杂的任务也要他去完成。如组织大型汇演，筹备艺术博物馆，负责梅兰芳先生逝世纪念的十项计划的实现，粉碎“四人帮”后筹备成立梅兰芳纪念馆等等，他都认真负责地一一去完成，从不拖延懈怠、敷衍了事。

我在艺术局和他共事期间，他也十分尊重集体意见，只要是党的决定，他都毫不迟疑地完成。我经常向他传达党内一些指示精神，介绍当前的政治形势，他都认真听取。我把他看成是戏剧界的前辈，对他很尊重，他也把我看成一位知友，无话不谈。他曾两次向我和艺术局党支部提出参加党的要求，但在要求他写思想自传的时候，他又怯于自己有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而迟迟难以

下笔。

彦祥同志在思想品德方面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胸襟坦荡，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他表里一致，不投机取巧，不背后搞“小动作”。他对不同的看法、做法，很少盲从，总是表明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有时他笑着对我说，他和他老师洪老一样，爱“抬杠”。有时这一对十分亲密的师生在一起也争个不休。他对这种爱争辩的习惯有时也作自我剖析，认为是“骄傲自大”的一种表现，我们则认为他的坦率和认真是一种优良品质。由于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因此他敢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公开责骂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致被逼辞职，不得不出走他乡。

十年动乱期间，我和他一起都成了“专政对象”。造反派们每天逼我们写“交代材料”，否则就是“不老实”。对于造反派们的这些做法，彦祥同志多方加以抵制。他私下告诉我，他利用写材料的机会，对自己追随党几十年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且根据事实，一一作了说明，以致被某些人认为他还在继续“放毒”。他还为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指导帮助，加以肯定和赞扬。这当然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不欢迎的，于是那些人又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借口，责令他“老实交代”，这从另一个方面充分显示了彦祥同志那种威武不屈的精神。

在如何对待上级领导，对待运动方面，他同样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有些做法敢于提出不同看法。解放初期，林彪等人要文化部在怀仁堂组织晚会演出京剧，其中点到《盘丝洞》这类有色情表演而又没有经过改革的剧目。他认为不适合演出，没有因为是“大人物”点的戏就勉强顺从，而是想法换了戏。

他对解放后一些运动也有自己的看法，如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他理论上是接受了，思想上有距离，有些做法也不大同意，这些他在1958年写自己的思想检查时，都写出来了，没有回避这些敏感问题。有些不同意见，当时就公开提出来了。1958年

全国上下大喊“放卫星”，文化部也成立了“放卫星”办公室，要求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大放“卫星”，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放卫星”，团团“放卫星”，他对此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向一位领导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把“卫星”庸俗化了，卫星是尖端的东西，如层层放“卫星”都成了“尖端”，也就没有尖端了。他还对“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异议，说这无异于是说作家可以没有思想和生活，只要掌握技巧就行了，在当时敢于这样提出问题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他的这种坦率直言、不顾压力的作风，正是他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追求真理的表现，也是帮助上级领导更能正确处理问题的一片忠贞之心，这种优良品德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

彦祥同志对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这是他又一特点。他在戏曲界人士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和许多戏曲艺术家、名演员们也能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在过去的文化部，除了田汉同志外，他联系戏曲人员最广，了解情况最多，也是最能够反映戏曲界的正当要求，最能为戏曲人员谋福利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热心为同志服务，剧协推举他担任福利部部长，他的一件重要成就就是主持戏剧上演报酬条例的制定，并经文化部颁布执行。尽管这个条例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在当时它无疑还是对戏剧创作的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

彦祥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既是导演又是剧作家；既是戏剧史论家，又是艺术实践家；既是戏剧教育家，又是社会活动家；既是报刊编辑，又是文艺编辑。他有丰富的学术修养，有很深的艺术造诣，他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他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业绩，在这短短的文章里，更难充分描述。我这里仅就我和他相处四十年的一点体会，写下几行文字，以表达我对这位戏剧前辈的尊敬和对一位挚友的深深怀念！

（1988年1月12日）

（原载《新文化史料》1988年1月第三辑）

## 《沙可夫诗文选》序

沙可夫同志(1903—1961年)是我国革命文化艺术工作方面的一位老战士,一位长期从事文艺事业组织领导工作的老同志。他是我党卓越的艺术教育家、优秀的翻译家;还是戏剧家,擅长编剧;他热爱音乐,在这方面很有修养;在诗歌和文学方面也很有功底。他的文艺修养渊博,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

早在中央苏区时代,沙可夫同志就主要负责文化艺术教育的领导工作,是我党艺术教育的开拓者。1932至1933年间,他先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校长由毛泽东兼),并与李伯钊、赵品三等同志一起筹建了我党第一所艺术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1938年初参加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并任副院长。后来他率领一批文艺干部,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区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主任。1941年文艺部改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1948年任华北大学三部主任,1953年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直到1961年病逝。在近三十个年头中,沙可夫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和许多文艺干部、艺术教育工作者一起,同心协力,为了发展文艺事业,培养优秀艺术

人才，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创造性，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沙可夫同志从领导苏区教育工作开始就明确地提出学校要服从总的政治方向，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际为革命需要培养干部，同时又要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准备人才。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以文艺为武器，为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正如他在中央苏区《工农剧社社歌》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歌》歌词中所写：“我们是工农革命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显示新社会的光明……”“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战士，用艺术作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因此，沙可夫同志在办学中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除了配备必要的干部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外，在课程内容和安排上都注意到革命战争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需要。在战争年代，除了业务课外，还有相当分量的军事训练课和政治理论课，同时十分重视形势与任务和文艺思想等专门问题的教育。他常说，一个文艺工作者不了解形势与任务，就很难做好工作，就像盲人骑瞎马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所以他经常亲自作形势与任务、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报告；经常组织师生去农村、工厂参加社会实践，如减租减息、土改、支前以及其他地方工作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向人民群众学习，树立坚定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人生观。

为了服从整个革命事业的需要和适应各个革命时期的客观形势，在办学方针上，沙可夫同志采取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进行教学的办法。一方面在学校内开设时间较长，比较系统的业务学习专门科系，培养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另一方面又从当时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用很大精力举办短期训练班，根据在职干部的实际需要，安排课程进行轮训、进修，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在鲁迅艺术学